

日常生活世界不僅是一個被社會中人普遍運用在其主觀上覺得具有意義的行為中視為理所當然的現實，它也是一個源自人們的思想和行動並一直被其視作是真實的世界。”“日常生活現實是以一個互為主觀的世界，也是一個我與他人共享的世界，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如果沒有與他人之間持續不斷的互動和溝通，我根本無法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美國學者彼得·伯格(Peter Ludwig Berger)、托馬斯·盧克曼(Thomas Luckmann)這番話表明，現實乃是一系列社會建構的產物，人們生存於現實世界之中，有賴於自身與他人持續不斷地交流溝通。自古以來，互動的媒介有多種，互動的方式也千差萬別。對於現代人而言，新聞是人與人之間進行互動溝通的主要途徑之一，亦是人們藉以建構現實的重要手段。

新聞是社會構建的產物。作為一種文化產品的新聞，作為一個行業的新聞業，並非孤立存在，它深受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必然打上不同時代的鮮明思想烙印，表現出不同於以往的文化特徵。在英國學者斯圖亞特·艾倫(Stuart Allan)看來：

“新聞作為一種‘公正’的社會知識，是文化構建的產物。”

“新聞是一種意識形態構建，這絕對是事實，而且極具爭議性。”“事件的媒介化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有變化的過程，主要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理解。新聞報導的完成，新聞報導本身並不是一個中立的行為，新聞報導生產、消費或‘閱讀’的過程，都應該從新聞文化的角度來理解。”

正是認識到了新聞的社會文化特性，1999年，斯圖亞特·艾倫在《新聞與文化》的重要意義。斯圖亞特·艾倫在《新聞與文化》一書中，不僅有研究中有經常提及的“媒介化”概念，也不乏“人文科學”的視野。……為了研究新聞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在政治、經濟緊密相連，在分析的方法上將新聞與文化分離出來，在“媒體”和“政治”問題已經進行了界定。……是它對於新聞與文化之間的分析卻付之闕如。依斯圖亞特·艾倫的觀點，將文化學研究方法納入新聞學研究視野，不僅可以吸取“媒體—社會”二元視角下對政治、經濟研究的成果，文化視角的加入，能夠使我們對新聞進行較為全面地分析。

2000年，童兵教授在其所著《理論新聞傳播學導論》中提出，新聞文化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鮮明的價值判斷”，“深刻的哲學思辨”，“特殊的商品性”，“作品形式的精美性”。在筆者看來，無論表現特徵如何，如同新聞一樣，新聞文化亦是社會構建的產物，從大的方面講，以下三種因素制約著新聞文化的內涵及其演變：

首先是新聞業自身理念的影響。例如，新聞專業主義是中外新聞學界、業界耳熟能詳的新聞理念與實踐規範，也是廣受關注的新聞學核心概念之一，它對於現代新聞文化的影響可謂深遠。其他不說，僅其核心理念之一——客觀性，就可以看作現代新聞業的立身之基。在新聞專業主義之前，主導新聞業的是鼓吹模式。新聞業基本上是上以服務黨派鬥

爭為基本生存方式，偶爾少數報紙不以此為辦報宗旨，結果都難逃破產關的命運。新聞專業主義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Karin Wahl-Jorgensen、Thomas Hanitzsch主編的《新聞學研究手冊》就設立專題討論了“新聞業中的客觀性、專業主義和真相”之間的關係。該文由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和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執筆撰寫，兩位作者強調了社會學視角對新聞專業主義研究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新聞學研究領域和社會學的分支領域對專業主義及專業制度的研究，幾十年來同時共存卻又相互漠不關心。但是，圍繞職業權力、權威以及專業地位等新聞學研究的大部分重要學術論題，每一次從社會學的視角對新聞及新聞專業主義進行考察，都會大有收穫，有利於澄清客觀性與專業主義之間的關係。Jorge Reinart主編的三卷本《傳播與信息百科全書》

姜華 著

現代思潮與新聞文化

羅伯特(Nancy L. Roberts)和喬凡納·奧爾特(Giovanna Dell'Orto)撰寫的“新聞業的專業主義”詞條。他們認為，美國南北戰爭後，隨著專業協會、倫理標準以及教育項目的建立，新聞業的專業主義開始出現，而更趨專業化的新聞業的標誌則是19世紀晚期新聞客觀性觀念的出現。此外，有關新聞專業主義的學術論文也層出不窮，從對新聞史的分析到對新聞業現實的考察，以不同的視角對此展開討論，有正面肯定的，也有給予批評的。無論褒貶，毫無爭議的是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為新聞業的行業文化奠定了鮮明的公共性色彩，而身其間的新聞工作者大都將為公眾服務作為自身工作的核心理念，而不僅僅是所在媒體的經濟利益。正是出於獻身公共利益的承諾，新聞記者必須具備一些必要的品質，如熟練運用語言的技巧，心甘情願努力工作的精神等；而對於新聞組織而言，就是要做到：(1)雖是贏利

其他行業的行為規範，最終成為新聞從業者內化於心的職業精神，無疑對新聞媒體乃至整個新聞業的新聞文化產生不容忽視的恆久影響。

其次是社會思潮的作用。無論是自由至上主義新聞理論、社會責任理論，還是後來的公共新聞學，都或多或少將新聞業看成一個獨立於社會的行業，正如斯圖亞特·艾倫所指出

新聞業的獨立性。新聞是信息的傳遞，事實的報道。雖然不假，但是這個信息和事實，是新聞活動主體在自身價值觀及整個社會的諸種思想觀念的框架中形成的。換言之，新聞業不是存於真空中，它與社會其他各領域共存，同時也是各類思潮激盪、爭奪、思想陣地的場域，因此新聞業及其行業文化必然受到社會諸領域和諸社會思潮的影響。從這個角度看，上述新聞理論頗具理想化色彩，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新聞和新聞業的真實圖景。例如，新聞專業主義的獨立性和現實基礎是自由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但需注意的是自由至上主義確定了新聞的獨立性，保證了新聞專業主義的獨立性，像獨立於社會諸領域之專業主義，甚至在崇尚經驗主義、甚至存在與自由至上主義對新聞業的直接作用，就無法獨立於社會之其。思潮，是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內部考慮，它又是自由至上主義在消費領域的重要體現。在消費主義影響下，新聞業表現出明顯的消費主義特徵。新聞消費主義又進一步推動了消費主義思潮的傳播和消費主義現象的擴展。以自由主義為依據的參與式民主思想與新聞專業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同時，隨著民主思想內部的演化，參與式民主理論的興起又成為公共新聞學誕生的思想基礎。近五年來，著名政治理論家約翰·基恩(John Keane)在充分思考新傳播技術的背景下，提出“新民主”的概念。公民新聞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體現了監督式民主的理念。與此同時，民粹主義思潮對當代新聞業的影響亦日趨顯現。無論是在社會穩定、秩序良好的西方發達國家，還是在社會利益分化、矛盾尖銳的欠發達國家，尤其是具有民粹傳統的拉丁美洲國家，新聞業無不深受民粹主義思潮影響，由此表現出鮮明的新聞民粹主義特徵。新聞業是社會變化的晴雨表，這些社會思潮潛移默化地“浸入”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的新聞業中，形成新聞文化的特定表現形態，並逐漸融入到新聞業及其從業者的日常新聞實踐中，對後者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再次是技術動因。美國學者詹姆斯·凱瑞(James W. Carey)探討了技術、文化與傳播的關係。他認為，“技術這是最實在的物質產品，從其產生之日起就徹底是文化的產物；它所展現的觀念和靈感實質上是一種創造與表達”，“技術與文化合二為一，就像知識舞臺上的一對孿生兄弟”，“只有將傳播與技術、社會結構的生動意義聯繫在一起，才能確保我們對文化有進一步的理解。”馬歇爾·麥克盧漢(McLuhan Herbert Marshall)說：“新媒介並不是舊媒介的增加，它不會讓舊媒介得到安寧。它永遠不會停止對舊媒介的壓迫，直到它為舊媒介找到了新的形態和地位。”英厄爾(Harold Innis)探討了媒介技術與傳播的關係。他對現代傳媒技術所擁有的控制力量表示了擔憂，厄爾·波茲曼(Neil Postman)進而將文化分為工具使用文化、技術統治文化和技術壟斷文化三種類型，表達了技術對文化侵蝕的憂慮。“在技術型盛行的環境裡，信息和人的意見之間的紐帶已斷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錄

序言	9
第一章 導論	15
一	16
二	23
三	26
四	33
第二章 自由主義思潮與新聞自由	39
第一節 從良心自由到出版自由	40
一、自由與秩序：出版自由問題的由來	41
二、出版自由的奠基：良心自由及其發端	44
三、神學視野中的出版自由觀：約翰·彌爾頓及其 《論出版自由》	48
四、出版（言論）自由的世俗化：約翰·洛克 與本尼迪克特·斯賓諾莎	52
第二節 新聞自由觀念的形成及其價值	58
一、從“liberty of the press”到“freedom of the press”： 新聞自由權利觀念的流變	59
二、功利、契約和折衷：關於新聞自由的爭論	67

第三節 自由的悖論：新聞業言論自由角色 與結構自由角色之衝突	76
一、言論自由角色是公民權利在新聞業的延伸	76
二、經驗傳統還是歐陸傳統：自由主義的內在緊張	82
三、言論自由角色與結構自由角色的觀念衝突	88
第四節 結語	93
第三章 自由的變異：新聞消費主義思潮的興起及影響	107
第一節 消費主義思潮的發展脈絡	109
第二節 新聞傳媒消費主義（一）：文化生產的視角	113
一、霍克海默、阿多諾與“文化工業”	113
二、當代新聞生產的消費主義表現	120
第三節 新聞傳媒消費主義（二）：傳媒對 消費社會的影響	124
一、“消費偶像”與消費社會	125
二、景觀社會與符號世界	129
第四節 結語	134
第四章 精英民主與新聞專業主義	141
第一節 為民主的新聞：一個新聞傳統價值觀的確立	143
一、公開議政：新聞介入民主	143
二、為大眾發聲：勞工報刊爭取民主的努力	145
三、獨立新聞業的興起：新聞民主價值觀的逐步確立	147
第二節 新聞專業主義：新聞民主的精英模式	153
一、精英民主：新聞專業主義生成的政治環境	154
二、新聞專業主義及其民主意涵	159

三、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新聞業與 精英民主的運行機制分析	168
第三節 結語	181
第五章 參與式民主與公共新聞 公民新聞	195
第一節 公共新聞：新聞民主的參與模式	196
一、傳統新聞業的危機與公共新聞的興起	197
二、公共新聞的思想起源	201
三、公共新聞與傳統新聞的觀念衝突	205
第二節 公民新聞：新聞民主的監督模式	211
一、何謂公民新聞	211
二、公民是誰：公民新聞的公民觀	215
三、以監督為核心：公民新聞的民主表現	219
第三節 結語	226
第六章 民主的變異：民粹思潮與新聞民粹主義	237
第一節 新聞民粹主義的理論淵源（一） ——政治民粹主義	238
第二節 新聞民粹主義的理論淵源（二） ——文化民粹主義	244
第三節 傳統新聞業與新聞民粹主義	250
一、新聞民粹主義：政治民粹與文化民粹的融合	250
二、拉丁美洲新聞業：“民粹核心區”的 新聞民粹主義	253
三、歐美等國的新聞民粹——從傳統民粹主義到 市場民粹主義	258

第四節 新媒體與新聞民粹主義	263
一、新媒體的特性使其成為民粹思潮產生的土壤	263
二、公民新聞、社會動員與民粹主義	267
第五節 結語	271
第七章 餘論：建構一種自由與公平的新聞文化	281
參考文獻	293
後記	330

序 言

大凡新聞傳播學的理论研究，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研究者出於自己的興趣，或者是為著解決當下新聞傳播業界亟需解決的問題，就一個方面或一些方面的議題進行針對性很強的、帶有應用或應對性質的研究。最近幾個月，為著編撰出版 2013 年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最新報告，我和選修我執教的“新聞傳播學前沿”課的博士研究生，一共檢索了發表於 2012 年各新聞學術期刊和高校學報上的 14000 多篇論文，這些論文及它們的作者的興趣，大多在新聞傳播學應用層面的研究上。另一類研究，則屬於基礎性理論研究。從事這類研究的研究者，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基礎性理論問題，比如新聞傳播的基本規律、新聞生產的運行特徵、新聞傳播的心理機制等等，深入進去，沉下心來，就概念界定、原理闡釋、方針演革、實踐描述，一一展開詳盡的、學理的、基礎性層面的理論研究。作這類研究的，這些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楊保軍是一個突出的例子。自 2001 年以來，他先後出版了《新聞事實論》（2001），《新聞價值論》（2003），《新聞真實論》（2005），《新聞活動論》（2005），《新聞精神論》（2007），《新聞本體

論》（2008），《新聞道德論》（2010）。新近撰寫完成的《新聞觀念論》也即將由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

近幾年，研究“媒介文化”者多於“新聞文化”。僅從引進版圖書看，有關媒介文化的著作就有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的《認識媒介文化》、吉見俊哉（Shunya Yoshimi）《媒介文化論》、比格納（James Bignell）《後現代媒介文化》、凱爾納（Douglas Kellner）《媒體文化》、布朗（Sheila Brown）《媒介文化中的罪與法》等，內地學者撰寫的相關著作數量則更多。究其原因，大概是媒介文化不僅可以輕鬆搭上“新媒介”、“新新媒介”的“便車”，與當下的學界熱點問題進行勾連，更為重要的，它更能輕鬆地藉助文學、哲學、社會學，甚至政治學、心理學、法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說媒介自己的話。反觀學界對新聞文化的研究，則不免生意興闌珊之感。內地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陸續有劉智、方延明、駱冬青、高金萍等人所寫的總共六七本著作出版，我自己在《理論新聞傳播學導論》中也專門對此作了分析。近幾年來，相關的專門研究已很難見到。相比內地對新聞文化研究日漸沉寂的狀況，國外的新聞文化研究卻有日漸興起之勢。專門性的研究著作有英國人斯圖亞特·艾倫（Stuart Allan）的《新聞文化》（目前已出版至第三版），美國學者 Dan A. Berkowitz 主編的《新聞的文化意義》，Paschal Preston 主編的《做新聞：歐洲的新聞業與新聞文化》等，而高質量的相關研究性論文近百篇，多刊發於歐美新聞傳播學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術期刊。在這種中冷西熱的狀況

下，姜華在上世紀 80 年代的熱潮退卻後，重新研究新聞文化是值得稱道的。

《現代思潮與新聞文化》在借鑒以上成果的基礎上，確立了自己的研究視角。依照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梁漱溟等中西方學者的觀點，文化可分為物質、制度和觀念三個層次，姜華在進行自己的研究時，沒有面面俱到地談新聞文化，他只將文化的觀念層面拎出來，進行基本上是純理性的考察與析分。在研究中，他提出了新聞文化的概念，“新聞文化是新聞活動主體在新聞活動中創造或表現出來的價值觀念和價值指向”。考慮到“不同時代學者有關新聞活動的思想和觀念直接或間接改變了新聞業及新聞活動主體日常新聞實踐的樣貌”，這些人的相關思想也在他的討論範圍中。在姜華看來，他所論證的新聞文化有三個特點，第一，“著眼於價值觀層面”。第二，“既超越‘媒體—社會’二元對立模式，又不僅僅探討新聞產品，而是著眼於整個新聞業”。第三，“打通‘內部’（新聞業）與‘外部’（社會）之間的藩籬，將新聞業放入社會整體之中考察其新聞文化”。在這樣的理念之下，他將自由主義、消費主義、民主主義、民粹主義等四個在歷史上和當代對新聞實踐產生重要影響的社會思潮作為研究索，將社會的思潮與新聞的文化進行“對接”，不僅使論文具有了較為堅實的理論支撐，也使研究富有現實感和針對性。接著，姜華從“自由主義思潮與新聞自由”、“自由的變異：新聞消費主義思潮的興起及影響”、“精英民主與新聞專業主義”、“參與式民

主與公共新聞、公民新聞”、“民主的變異：民粹思潮與新聞民粹主義”等幾個方面展開詳細討論和辨析。在他看來，“新聞自由是新聞民主的基礎，同時變異的新聞自由又是新聞消費主義興起的肇因；新聞業本身諸多理念體現了新聞民主，而新聞文化民主觀的變異又導致新聞民粹主義的風行”。論文通過以上幾方面的分析，基本上勾勒出價值觀層面的新聞文化的成因、特徵及其演變。讀者從中不難看出，姜華對新聞文化中的複雜現象是有自己的價值判斷的，對於有利於新聞業發展的文化傳統和新聞理念，他力圖詳加論證，充分肯定其價值。對於變異的新聞觀念，他則想方設法弄清其來龍去脈，希望引起人們的警惕。正是出於這樣的動機，在餘論中，他提出“建構一種自由與公平的新聞文化”的設想，並論證了建構這種新聞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這對當代新聞業發展無疑是有意義的。

當然，由於寫作時間短，有些問題尚需深入思考。例如，在論述四種思潮影響下的新聞文化時，作者有意無意地將某一種思潮與某一國家或者地區對應起來（雖然作者在導論中對此作了說明，說是出於論述方便的考慮），這是不是很合理？此外，論文層次雖然較為清晰，但是各章之間的聯繫呈現得不夠緊密，這使論文在整體結構上顯得有點兒鬆散。最後我還想指出，姜華這部博士論文的語言是不錯的，不僅寫得清楚、準確，文筆還生動和優美。理論文章能寫到這種程度，是不容易的。

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姜華博士的學位論文《現代思潮與新聞文

化》，作者從事的研究也可歸入基礎性理論研究。2010年秋天，他開始攻讀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考慮到他平時喜歡讀書，特別是酷愛社會文化一類的著作，買了許多，閱讀得更多，而且勤於思索，編過好幾本文化味濃鬱的小冊子，我希望他圍繞新聞文化多做些研究，多作些思考。最後，師生決定以社會思潮和新聞文化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在我的印象中，他這個北方漢子有著南方人的性格，心思細膩，做事認真，甚至有時候還顯得有些拘謹，同時北方人待人誠懇、胸無城府的性格也表現得很充分。攻讀博士學位的三年裡，除學習壓力之外，他還要面對忙碌繁雜的編務工作。開始時，我擔心他能否如期完成學業。轉眼間，三年過去了，他不僅按時畢業，而且很快將論文重新修改並付梓出版。作為導師，我很欣慰，也替他感到高興。姜華性格安靜，尤喜讀書，發表了不少質量不錯的論文，衷心祝願他能取得更多的學術成果。

是為序。

童 兵

癸巳年初秋於上海文化佳園

童兵教授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後流動站站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五屆學科評議組成員，新聞傳播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

第一章

導論



“日常生活世界不僅是一個被社會中的普通人在其主觀上覺得具有意義的行為中視為理所當然的現實，它也是一個源自人們的思想和行動並一直被其視作是真實的世界。”“日常生活現實是以一個互為主觀的世界，也是一個我與他人共享的世界，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如果沒有與他人之間持續不斷的互動和溝通，我根本無法在日常生活中存在。”¹ 美國學者彼得·伯格（Peter Ludwig Berger）、托馬斯·盧克曼（Thomas Luckmann）這番話表明，現實乃是一系列社會建構的產物，人們生存於現實世界之中，有賴於自身與他人持續不斷地交流溝通。自古以來，互動的媒介有多種，互動的方式也千差萬別。對於現代人而言，新聞是人與人之間進行互動溝通的主要途徑之一，亦是人們藉以建構現實的重要手段。

新聞是社會構建的產物。作為一種文化產品的新聞，作為一個行業的新聞業，並非孤立存在，它深受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必然打上不同時代的鮮明思想烙印，表現出不同於以往的文化特徵。在英國學者斯圖亞特·艾倫（Stuart Allan）看來：

“新聞作為一種‘公正’的社會知識，是文化構建的產物。”²

“新聞是一種意識形態構建，這種對現實的構建極具爭議性。”³ 事件的媒介化是一個持續不斷而富有變化的過程，主要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判斷該過程的完成，新聞報道本身並不是過程的終點。相反，新聞報道生產、消費或‘閱讀’的背景情況複雜多變，應

該從新聞文化的角度批判地對其進行考慮。”³

正是認識到了新聞生產、消費及閱讀過程中的複雜性，1999年，斯圖亞特·艾倫提出研究“新聞文化”的重要意義。新聞文化的研究視野可以避免新聞學既有研究中經常採用的“媒體—社會”二元結構的不足——“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對新聞媒體做了廣泛的研究，……為了研究起見，‘媒體—社會’二元論在這些研究中都處於突出的地位。這種二元論認為媒體和社會的關係在各個方面都相對獨立。”⁴文化與政治、經濟緊密相連，“‘新聞文化’這一概念避免了在分析的方法上將‘文化’從‘經濟’和‘政治’中分離出來，‘媒體—社會’二元論對‘經濟’和‘政治’問題已經進行了界定”。⁵但是它對於新聞與文化之間的分析卻付之闕如。依斯圖亞特·艾倫的觀點，將文化學研究方法納入新聞學研究視野，不僅可以吸取“媒體—社會”二元視角下對政治、經濟研究的成果，文化視角的加入，能夠使我們對新聞進行較為全面地分析。

2000年，童兵教授在其所著《理論新聞傳播學導論》中提出，新聞文化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鮮明的價值判斷”，“深刻的哲學思辨”，“特殊的商品性”，“作品形式的精美性”。⁶在筆者看來，無論表現特徵如何，如同新聞一樣，新聞文化亦是社會構建的產物，從大的方面講，以下三種因素制約著新聞文化的內涵及其演變：

首先是新聞業自身理念的影響。例如，新聞專業主義是中外新聞學界、業界耳熟能詳的新聞理念與實踐規範，也是廣受

關注的新聞學核心概念之一，它對於現代新聞文化的影響可謂深遠。其他不說，僅其核心理念之一——客觀性，就可以看作現代新聞業的立身之基。在新聞專業主義之前，主導新聞業的是鼓吹模式。新聞業基本上是以服務黨派鬥爭為基本生存方式，偶爾有少數報紙不以此為辦報宗旨，結果都難逃破產關門的命運。新聞專業主義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Karin Wahl-Jorgensen、Thomas Hanitzsch 主編的《新聞學研究手冊》就設立專題討論了“新聞業中的客觀性、專業主義和真相”之間的關係。該文由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和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執筆撰寫，兩位作者強調了社會學視角對新聞專業主義研究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新聞學研究領域和社會學的分支領域對專業主義及專業制度的研究，幾十年來同時共存卻又相互漠不關心。但是，圍繞職業權力、權威以及專業地位等新聞學研究的大部分重要學術論題，每一次從社會學的視角對新聞及其專業主義進行考察，都會大有收穫，有利於釐清客觀性與專業主義之間的關係。⁷ Jorge Reina Schement 主編的三卷本《傳播與信息百科全書》亦收錄了由南希·羅伯特（Nancy L. Roberts）和喬凡納·戴爾奧特（Giovanna Dell’Orto）撰寫的“新聞業的專業主義”詞條。他們認為，美國南北戰爭後，隨著專業協會、倫理標準以及教育項目的建立，新聞業的專業主義開始出現，而更趨專業化的新聞業的標誌則是 19 世紀晚期新聞客觀性觀念的出現。⁸ 此外，有關新聞專業主義的學術論文也層出不窮，從對新聞史的分析到對新聞業現實的考察，以不同

的視角對此展開討論，有正面肯定的，也有給予批評的。⁹ 無論褒貶，毫無爭議的是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為新聞業的行業文化奠定了鮮明的公共性色彩，廁身其間的新聞工作者大都將為公眾服務作為自身工作的核心理念，而不僅僅是所在媒體的經濟利益。正是出於獻身公共利益的承諾，新聞記者必須具備一些必要的品質，如熟練運用語言的技巧，心甘情願努力工作的精神等；而對於新聞組織而言，就是要做到：（1）雖是贏利企業，卻獨立於其他商業機構，（2）日常工作的有效工具是時效性，（3）鍛造影響日常新聞實踐的競爭精神。¹⁰ 這些新聞理念規範著新聞從業者的日常新聞實踐，使新聞業形成了迥異於其他行業的行為規範，最終成為新聞從業者內化於心的職業精神，無疑對新聞媒體乃至整個新聞業的新聞文化產生不容忽視的恆久影響。

其次是社會思潮的作用。無論是自由至上主義新聞理論、社會責任理論，還是後來的公共新聞學，都或多或少將新聞業看成一個獨立於社會的行業，正如斯圖亞特·艾倫所指出的，以上新聞理念多從“媒體—社會”二元視角對新聞業進行考察，這在無形之中誇大了新聞業的獨立性。新聞是信息的傳遞、事實的報道固然不假，但是這個信息和事實，是新聞活動主體在自身價值觀及整個社會的諸種思想觀念的框架中完成的。換言之，新聞業不是存於真空中，它與社會其他各領域共存，同時也是各類思潮激盪、爭奪思想陣地的場域，因此新聞業及其行業文化必然受到社會諸領域和諸社會思潮的影響。從這個角度

看，上述新聞理論頗具理想化色彩，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新聞和新聞業的真實圖景。例如，新聞專業主義得以實現的一個思想前提和現實基礎是自由主義思想及其理念在西方社會的確立。但需注意的是自由主義並非鐵板一塊，如果說自由至上主義奠定了新聞業獨立自由的特殊行業地位，保證了新聞專業主義的實現，並使得新聞業好像獨立於社會諸領域之外，那麼歐陸傳統的自由主義，甚至在崇尚經驗主義的一部分英國思想家中，也存在與自由至上主義迥然不同的自由觀，後者對新聞業的直接作用，就是使人們認識到新聞業並不能獨立於社會之外，其自由有其限度。消費主義思潮，是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產物，從自由主義體系內部考慮，它又是自由至上主義發展到極端在消費領域的重要體現。在消費主義思潮影響下，新聞業表現出明顯的消費主義特徵，而新聞消費主義又進一步推動了消費主義思潮的傳播和消費主義現象的擴展。以自由主義為依託的精英式民主思想與新聞專業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同時，隨著民主思想內部的演化，參與式民主理論的興起又成為公共新聞學誕生的思想基礎。近五年來，著名政治理論家約翰·基恩（John Keane）在充分思考新傳播技術的背景下，提出監督式民主的概念。公民新聞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體現了監督式民主的理念。與此同時，民粹主義思潮對當代新聞業的影響亦日趨顯現。無論是在社會穩定、秩序良好的西方發達國家，還是在社會利益分化、矛盾尖銳的欠發達國家，尤其是具有民粹傳統的拉丁美洲國家，新聞業無不深受民粹主義思潮影響，由此表現

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多位學者對文化概念進行了闡釋。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看來，文化至少應該包含三個不同的層面，一是用來描述 18 世紀以來思想、精神與美學發展的一般過程。二是表示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關於一個民族、一個時期、一個群體或全體人類。三是用來描述關於知性的作品與活動。²⁷ 將特殊的生活方式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行考察，拓寬了阿諾德（Matthew Arnold）、利維斯（Frank Raymond Leavis）等人的精英文化論，子文化、次文化等多元的文化視角成為其關注和研究的重要方面。伯明翰學派的學者第一次真正把大眾和大眾文化當成了研究的對象，他們充分肯定了大眾文化的意義和大眾的主觀能動作用。該派的領軍人物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認為大眾文化是被壓迫者文化反對權力支配的“鬥爭場所”，大眾在這個競技場中有較大的自主性，而不是完全處於被支配地位。霍爾在《編碼，解碼》一文中指出，信息生產的權利關係與消費的權利關係並不是完全吻合的，並提出受眾的三種解碼方式，即“支配—霸權立場”，受眾立場與傳者立場完全一致；“協商立場”，受眾不完全同意也不完全反對傳者立場；“對立立場”，受眾有自己的解碼方式。²⁸ 此外，莫利（David Morley）、費斯克（John Fiske）等人也不同程度地對大眾文化進行了解讀。尤其是費斯克，對大眾新聞進行了文化解讀。

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強調了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他從概念、結構和實踐三個角度對文

化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文化最主要的特點在於它自身的“矛盾性”——“‘文化’概念最主要的矛盾反映了創造秩序觀念的矛盾性，這種觀念是所有現代存在的核心”，而“創造秩序觀念的邏輯矛盾反過來反映了通過創造秩序實踐所建構的真正的社會矛盾”。文化的矛盾性反映在人們對其理解的兩個不同層面中，“一種話語將文化觀念作為自由馳騁的精神活動，以及創造、發明、自我批評和自我超越的場所；另一種話語則將文化假定為一種例行化和連續性的工具，即一種社會秩序的婢女”。用鮑曼的話說：“文化既是秩序的工具也是失序的動因；既是一個過時的因素也是一個永恆的因素”——“文化的自我保存不在於模式，而在於修正、變動或以其他模式取代它的動力，隨著時間的流逝它依然是可行和有效的。因此，文化的悖論可以重新表述為：任何用於模式保存的東西都暗中破壞了其自制力。”²⁹ 雷蒙德·威廉斯也曾將文化看成創造秩序的手段，他認為，文化是“表意系統，通過它……一種社會秩序得以轉達、再生產、體驗和研究”。³⁰ 在阿蘭·斯威伍德（Alan Swingewood）的視野中，文化“是一種實踐，是以意識、行動與特定的價值觀作為基礎，然後尋求改變世界的一種手段”。文化“絕非只是大量生產的一些產品，文化是一種手段，足以賦予人們塑造或改造社會世界，使之更為符合人性，文化也是在社會關係的物質基礎不斷進步以後的一種社會實踐”。³¹

特瑞·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認為“文化可以鬆散地概括為構成特殊群體生活方式的價值觀、習慣、信念和慣例的

聯合體”，在充滿歷史危機的時候更顯重要——“當它成為一個墮落社會惟一明顯的選擇的時候；當藝術和美好生活意義上的文化在沒有深刻的社會變革的情況下好像就不再可能的時候；當它提供了群體或個人尋求其政治解放條件的時候；當帝國主義國家被迫與其所正負的人們的生活方式妥協的時候。”從這個角度講，伊格爾頓認為“文化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由於這些條件可能關係到國家，文化還會具有政治的維度”。³² 約翰·B. 湯普森（John B. Thompson）則從意識形態的角度探討了現代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關係。湯普森最具特色的理論貢獻，在於他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文化概念分為古典、描述性、象徵性和結構性四個層次。具體而言，古典概念是指“智力或精神發展的過程”；描述性概念是指“一個群體的或社會的文化是人們作為該群體或社會成員所具有的一批信仰、習俗、思想和價值觀，以及物質製品、物品和工具”；象徵性概念是指“體現於象徵形式（包括行動、語言和各種有意義的物品）中的意義形式，人們依靠它互相交流並共同具有一些經驗、概念與信仰”；結構性概念融合了象徵與社會背景考察，“文化現象被視為結構性背景中的象徵形式”，文化分析就是“對象徵形式的意義構成和社會背景性的研究”。³³

考察國內學者對於新聞文化的理解，就會發現以往對新聞文化概念的界定過於寬泛，對於其內涵的闡釋不夠清晰。其主要問題在於概念沿襲文化學中關於“文化”的界說，卻沒有彰顯出“新聞文化”的“新聞屬性”來。

筆者認為，新聞文化是新聞活動主體在新聞活動中創造或表現出來的價值觀念和價值指向。不同時代學者有關新聞活動的思想和觀念直接或間接改變了新聞業及新聞活動主體日常新聞實踐的樣貌，亦在筆者討論之中。簡而言之，筆者所討論的新聞文化具有如下三個方面的特徵。

第一，著眼於價值觀層面的新聞文化。依據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梁漱溟等學者的看法，文化可以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三層次，20世紀八九十年代，劉智先生在其較有影響的有關新聞文化的幾部著作中，即採用了上述劃分方法，將新聞文化分為物質、制度、觀念三個方面。只是囿於時代所限，劉先生的研究雖然涉及面較寬，但在各個部分尤其是觀念層面闡述並不深入，有些部分甚至還有脫離新聞業之嫌。齊格蒙特·鮑曼、特里·伊格爾頓、約翰·湯普森、阿蘭·斯威伍德對文化有不同界定，但共同點在於他們都不約而同強調價值觀在文化含義中的核心地位。李良榮教授也認為，“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³⁴基於以上分析，本書認為，中西方不同領域的研究表明，價值觀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它不僅制約了制度文化的表現形式，對物質文化如何發揮作用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以上的文獻綜述也表明，在新聞文化研究領域，國內以往的研究在這方面關注不夠。2000年以來，國外的研究雖然注意到價值觀念這一層面，但是系統性的研究尚不多見，因此本書對新聞文化的研究選取了觀念層面作為立足點。與以往新聞生產社會學中對新聞生產者的重視不同，此處所提及的新

聞活動主體，不僅包含新聞生產者，也包含新聞傳播者和新聞消費者，是他們共同創造了新聞文化。新聞活動不僅是指傳統的組織化的新聞生產、傳播和消費活動，非組織化的個體性的新聞生產、傳播和消費自然也包含在內。

第二，既超越“媒體—社會”二元對立模式，又不僅僅探討新聞產品，而是著眼於整個新聞業。從考察對象上看，斯圖亞特·艾倫教授等人的研究，雖然擺脫了“媒體—社會”二元對立的模式，使用“新聞文化”這一概念解釋了新聞生產、傳播、消費過程中的複雜性，但因探討局限於新聞產品自身、新聞業運作的諸多環節，尤其是結構性的問題，沒有得到認真對待。為避免此問題，本書遵循德國學者 Thomas Hanitzsch 的思路，從“Journalism Culture”層面上考察社會思潮與新聞文化的關係。在筆者看來，“Journalism Culture”涵蓋了“News Culture”，與筆者所討論話題比較契合。但是，包括 Thomas Hanitzsch 教授在內，很多西方學者將新聞文化等同於新聞理念，在具體的研究上，不僅使新聞文化的研究範圍大為縮小，同時也沒有擺脫斯圖亞特·艾倫教授所注意到的以往新聞學研究中存在的“媒體—社會”二元對立的窠臼（倒是英國學者 Brain McNair、Paschal Preston 和美國學者 Barbie Zelizer 等人的研究視野突破了新聞理念自身的限制，將新聞文化置於更廣闊的政治、經濟、文化諸社會因素中加以考察，與筆者所取路徑最為相近）。與 Thomas Hanitzsch 教授主要探討新聞記者、新聞工作本身的認知層面、價值層面、行動層面所不同的是筆者著力

點在於價值觀層面的新聞文化如何深受外部現代思潮的影響，以及在其影響之下，它有哪些重要的表現形態，進而使整個新聞業及其從業者的認知、價值和行動發生了何種變化。

第三，打通“內部”（新聞業）與“外部”（社會）之間的藩籬，將新聞業放入社會整體之中考察其新聞文化。之所以採用“新聞文化”這一概念，而沒有沿用“新聞理念”的說法，是因為在筆者看來，新聞文化與新聞理念存在較大差異。新聞理念主要是指新聞業在自身運作過程中遵循的指導思想與行業規範，它們往往會給人新聞業乃是一個自足行業的印象，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新聞業與社會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而新聞文化恰好可以彌補這一不足，它強調新聞業置身於社會之中，與社會諸要素之間密切互動，既建構外部世界，又深受外部世界的影響。例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伴隨實踐逐漸豐富，西方學者大都將其視為新聞文化的組成部分。而與之有密切關係的社會責任理論，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其成效雖然未必立竿見影，但是其有關新聞媒體公共性的價值訴求也一直延續下來，成為與新聞專業主義並駕齊驅的理念，也應將其看成新聞文化的重要表現。³⁵ 但是，這些新聞理念的假設前提依然是新聞傳媒擁有自足地位（在社會責任論中，研究者的立場稍有變化，但是仍然沒有擺脫這一根本立場）。我們需要強調的，是這些新聞理念的形成及演變都會受到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新聞理念是構成新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卻並非新聞文化的全部。

四

本書以自由主義思潮、消費主義思潮、民主思潮、民粹思潮等四大社會思潮為綱，考察社會思潮影響下，新聞文化的四種表現形態——新聞自由，新聞消費主義，新聞民主以及新聞民粹主義——的形成、特徵、演變及其內在聯繫。本書認為，新聞自由是新聞民主的基礎，同時變異的新聞自由又是新聞消費主義興起的肇因。新聞業本身諸多理念體現了新聞民主，而新聞文化民主觀的變異又導致新聞民粹主義的風行。本書期望通過對以上四個方面的分析，勾勒出價值觀層面的新聞文化的成因、特徵及其演變。在書中，作者主要討論了如下相關問題：新聞業是如何藉助自由主義思潮而確立新聞自由的，自由主義思潮內部的紛爭與分歧對新聞自由的內涵產生了何種影響？在確立新聞自由的過程中新聞業曾遭遇哪些挫折？不同時期的不同社會群體是如何看待新聞自由的？自由至上主義的現代復興以及新聞業的壟斷趨勢，致使消費主義新聞文化日趨明顯，這種新聞文化正在如何改變著當代新聞業的發展？它與 20 世紀初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凡伯倫（Thorstein B. Veblen）等人的消費思想有何關係，又是在何種程度上體現了 20 世紀四五十年代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有關文化產業的分析？現代民主思潮大致有精英民主與參與式民主之分，二者是如何與新聞專業主義和公共新聞運動結合在一起的？

新傳播技術的出現和公民新聞的崛起又是如何強化了約翰·基恩所言稱的晚近出現的監督式民主的？民主思潮的變異導致民粹主義的興起，民粹主義新聞文化有何表現，對新聞業發展產生了何種弊端？為何拉丁美洲的新聞從業者洞悉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同時卻又自覺地在新聞活動中保留了民粹主義的傾向？新媒體中的民粹思潮又是如何與傳統媒體進行互動，進一步加劇新聞民粹主義的？正是因為新聞業存在這樣那樣的令人詬病之處，如何建構自由與公平的新聞文化，促進新聞業朝著更值得期待的方向邁進？這些問題都將在本書中陸續得到討論。

此外，需要申明的是新聞文化的四種表現形態——新聞自由、新聞民主、新聞民粹主義和新聞消費主義，常常並存於一國或一地的新聞業中。在行文過程中，筆者將各個形態分開闡述，僅僅是因為新聞文化的某種表現在某一國家或某一地區的新聞業中最為突出，出於闡述方便，才將某種新聞文化形態與一國、一地勾連在一起，這並不表明某一國、某一地的新聞業中就沒有其他形態的新聞文化存在，而只是通觀其整個新聞業，其他形態僅居於次要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地位而已。

恰如阿蘭·斯威伍德所言，“文化是一種手段，足以賦予人們塑造或改造社會世界，使之更為符合人性，文化也是在社會關係的物質基礎不斷進步以後的一種社會實踐”。³⁶ 作為文化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現代人類生活的最重要精神活動之一，新聞是塑造和改造世界的一種社會實踐活動。同時，又如鮑曼所講，文化是矛盾的，既是秩序的建構者，又是失序的開端。從

現實角度看，新聞又何嘗不是如此？尤其是在新的傳媒技術不斷出現的情況下，新聞所蘊含的矛盾性、複雜性的特徵更加明顯。這些豐富的新聞實踐構建了新聞文化的景觀，而技術變遷又為新聞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各種社會思潮因為技術帶來的便利而深深滲透到當代新聞活動中，使其彰顯出與眾不同之處。對新聞文化進行分析，不僅有利於人們清楚認識當前新聞傳播諸活動中的新現象、新問題；也有利於新聞業在日趨複雜的新聞傳播活動中做出有效應對。

註釋：

- 1 彼得·伯格、托馬斯·盧克曼著，汪湧譯：《現實的社會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20 頁。
- 2 斯圖亞特·艾倫著，方潔等譯：《新聞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2 頁。
- 3 同上書，第 5 頁。
- 4 同上書，第 2—3 頁。
- 5 同上書，第 4—5 頁。
- 6 童兵：《理論新聞傳播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2—114 頁。
- 7 Karin Wahl-Jorgensen, Thomas Hanitzsch.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88-101.
- 8 Jorge Reina Schement(Editor in Chief).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2, pp.497-499.
- 9 20 世紀 60 年代起即有學者關注新聞業的專業主義問題，如 McLeod, Jack M. and Hawley, Searle E., Jr., “Professionalization among Newsmen”, *Journalism Quarterly*, Autumn 1964; Vol.41, pp.529-538. James W. Markham, Jack McLeod,